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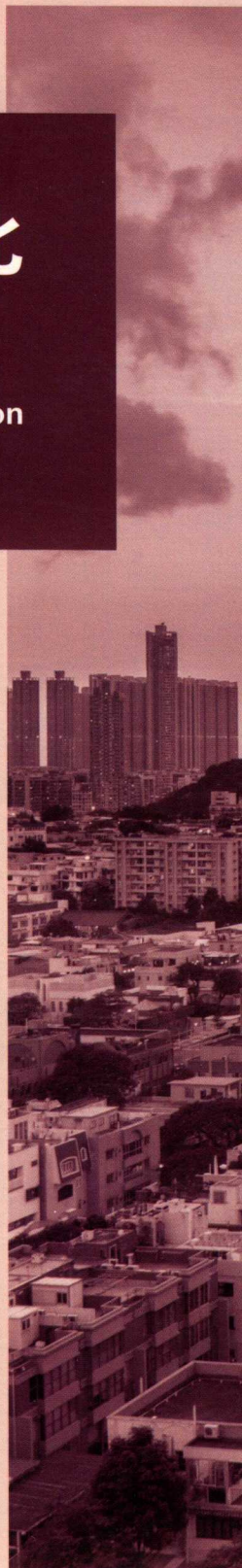
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 路径模式及空间组织

The New Urbanization Path Model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unties in Central China

◎ 黄亚平 刘凌云 陈 瞻 著



科学出版社



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 模式及空间组织

黄亚平 刘凌云 陈 瞻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模式及空间组织研究——以湖北省为例”(511782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湖北县域城镇化‘自极化’效应与空间范型研究”(516084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城市都市区‘紧凑·多核·弹性’地域空间结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514781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形态城市微气候耦合机理与控制”(51538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部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与空间组织研究”(2016IVA031)、“中部地区乡村收缩空间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2017IVB044)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聚焦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在湖北省县域经济单元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中部县域城镇化测度的“五力雷达模型”，综合考量城镇化数量、速度、质量、动力、空间五大领域。运用自组织理论，建构城镇化“外部作用—内部作用—边界作用”的动态演化机制，并创新提出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经济力主导、政策力保障、社会力助推”的市场主动力模型。在三类县域现状测度的基础上，通过多因子相关分析，提出大城市城郊型区县、平原农业县、欠发达山区县的县域城镇化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三类县域城镇化表现特征、城镇体系结构特征及趋势，构建大城市城郊型区县、平原农业县、欠发达山区县的空间范型。

本书可供政府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科研人员、规划设计人员及高校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参考。

审图号：鄂 S (2018) 0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模式及空间组织 / 黄亚平, 刘凌云, 陈瞻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03-059336-8

I. ①中… II. ①黄… ②刘… ③陈…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9298 号

责任编辑：孙寓明 / 责任校对：董艳辉

责任印制：彭 超 / 封面设计：苏 波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1/2

字数：436 000

定价：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黄亚平：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湖北省城乡规划学会理事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主持省部级科研、教研项目 8 项；出版著作 8 本，主编论文集和作品集 5 本，发表论文 90 余篇；主持规划设计项目 100 余项，其中，获省级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4 项，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空间规划研究。

刘凌云：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校级自主创新研究基金 2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主编专著 1 部，发表论文约 20 篇；主持、参与规划设计项目 30 余项，其中获国家级，省级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4 项。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城镇化、城市空间规划、城市设计。

陈瞻：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梓山湖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城镇化，新城开发。

前 言

自“十五”以来，推进城镇化发展成为国家战略。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首次将“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作为十一个“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之一。其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成为国家调整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十二五”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加速；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可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的认识上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国家政府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先哲早就洞悉县的重要性。“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县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最为重要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县域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及“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中部地区城镇化相对滞后，乡村人口比重高（占全国乡村人口的1/3），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约1.2亿人）；同时中部地区又是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及生态安全的重点区域，探讨中部地区县域速度与质量并重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模式，可以为我国形成新型城镇化道路积累基础；以湖北省为案例，探索县域新型城镇化空间成长规律及空间组织优化模式，可以推进中国特色的城乡地域空间结构基本范型研究，完善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理论。

本书以湖北省为例，旨在探索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模式，并试图揭示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空间组织特征，提出空间规划调控对策。本书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等项目的研究基础上，由基金项目团队成员共同完成。

本书第1章由余俊、刘凌云撰写；第2章由刘凌云撰写；第3章由陈瞻撰写；第4章由刘凌云、陈瞻撰写；第5章由刘凌云、林小如、韩启蒙、姜珊撰写。黄亚平担任本书总体设计及统稿工作；刘凌云担任本书的插图绘制及修改工作。

书中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黄亚平

2018年7月1日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中外农村城镇化特征、动力及路径模式	1
1.1 中外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1
1.1.1 美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1
1.1.2 英国、法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5
1.1.3 日本、韩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7
1.1.4 中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9
1.2 中外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	14
1.2.1 动力机制解读框架	14
1.2.2 相同动力因子解析	14
1.2.3 相异动力因子解析	17
1.2.4 动力机制模型构建	22
1.2.5 主导动力机制比较	23
1.3 中外农村城镇化路径模式	25
1.3.1 美国模式：规模化农业带动的协调服务型城镇化	25
1.3.2 英法模式：多功能农业与特色三产带动的生态绿色型城镇化	27
1.3.3 日韩模式：精品农业与中小企业带动的文化凸显型城镇化	29
1.3.4 中国模式：乡村工业化带动的资源依赖型城镇化	34
1.3.5 中外农村城镇化模式总结	39
1.4 我国农村城镇化路径选择	40
1.4.1 国外农村城镇化模式的可行性分析及借鉴	40
1.4.2 我国农村城镇化路径的合理选择	43
第 2 章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自组织演化过程与特征	48
2.1 城镇化的自组织规律	48
2.1.1 自组织系统与城镇化的自组织性	48
2.1.2 城镇化自组织外部作用与动态演化	54
2.1.3 城镇化自组织边界作用与开放形式	59
2.1.4 城镇化自组织内部作用与结构适应	60
2.1.5 小结	66

2.2	县域城镇化自组织演化过程与特征	67
2.2.1	1949~1978年:徘徊萎缩阶段	68
2.2.2	1979~1985年:补偿增长阶段	69
2.2.3	1986~2000年:差异演化阶段	71
2.2.4	2001年至今:深度分化阶段	73
2.2.5	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现状特征	75
第3章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及其时空特征	80
3.1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	80
3.1.1	空间生产理论的引介	80
3.1.2	资本三重循环与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	85
3.1.3	新型资本循环与县域城镇化动力导向	91
3.2	县域城镇化测度方法	93
3.2.1	基于资本循环的县域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93
3.2.2	测度指标体系的应用方法	102
3.2.3	测度指标体系的成果形式	107
3.2.4	测度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	111
3.3	县域城镇化特征识别	112
3.3.1	实证对象选取与数据提取	112
3.3.2	全省层面五力雷达模型单因子识别	117
3.3.3	案例单元“二维变量”协调度识别	123
3.3.4	典型特征与突出问题	129
第4章	中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驱动机制	133
4.1	县域城镇化自组织动力机制	133
4.1.1	外部作用:政府“抽”、市场“吸”、自然“弱”	133
4.1.2	边界作用:地理交通束缚、制度政策抑制	136
4.1.3	内部作用:等级、职能、空间结构三极化	141
4.1.4	城镇化自组织动力机制	146
4.2	县域城镇化主动力模式	148
4.2.1	动力机制重构缘由	148
4.2.2	基于新型资本循环的主动力模式	151
4.2.3	主动力模式的“市场作用”	154
4.2.4	主动力模式的“保障基础”	159
第5章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类型及路径模式	162
5.1	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类型分析	162
5.1.1	单一指标的排序分析	162
5.1.2	复合指标的聚类分析	165
5.1.3	自组织类型分析	173
5.1.4	小结	174
5.2	大城市城郊型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模式	174

5.2.1	人口路径: 积极引导人口输入、双核吸纳就地安置	174
5.2.2	产业路径: 主动对接产业溢出、集群带动结构优化	175
5.2.3	空间路径: 由近及远圈层重构、新城组群多极增长	177
5.2.4	大城市城郊型县域城镇化模式总结	178
5.3	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模式	178
5.3.1	人口路径: 积极响应人口回流、重点打造主副中心	178
5.3.2	产业路径: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发挥农业规模优势	179
5.3.3	空间路径: 轴线带动板块重构、一主多副极化发展	181
5.3.4	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模式总结	182
5.4	山区欠发达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模式	182
5.4.1	人口路径: 输出有序精明减缩、由乡到城梯次迁移	182
5.4.2	产业路径: 工贸带动特色促进、产业融合协同发展	185
5.4.3	空间路径: 中心极化节点集聚、打破均衡有机分散	189
5.4.4	交通路径: 对接周边省市干线、构筑县域放射网络	191
5.4.5	生态路径: 保护县域生态格局、资源集约绿色开发	193
5.4.6	山区欠发达县域城镇化模式总结	195
第 6 章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空间范型	196
6.1	大城市城郊型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空间范型: 以黄陂区、大冶市等为例	196
6.1.1	表现特征	196
6.1.2	结构分析	201
6.1.3	趋势判研与空间范型	208
6.1.4	小结	213
6.2	平原农业地区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空间范型: 以仙桃市、汉川市等为例	214
6.2.1	表现特征	214
6.2.2	结构分析	218
6.2.3	趋势判研与空间范型	224
6.2.4	小结	230
6.3	山区欠发达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空间范型: 以英山、麻城等为例	230
6.3.1	表现特征	230
6.3.2	结构分析	235
6.3.3	趋势判研与空间范型	242
6.3.4	小结	247
	参考文献	248
	附录 1 省域尺度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	251
	附录 2 2012 年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排名	252
	附录 3 2012 年湖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经济动力测度指标	253
	附录 4 2012 年湖北省县域单元市政公用设施水平测度指标	256
	附录 5 2012 年湖北省县域单元人口与建设用地测度指标	258
	附录 6 中部地区城镇化五力测度模型属性	260

附录 7	湖北省案例县市城镇化五力测度模型原始数据	262
附录 8	湖北省汉川市城镇化协调度横纵向测度数据	264
附录 9	湖北省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基础数据 (2010 年)	266
附录 10	湖北省县市区城区人口规模一览 (2010 年)	271
附录 11	湖北省建制镇镇区人口规模一览 (2010 年)	273
附录 12	县域城镇化自组织空间范型 20 个样本县域相关数据 (2010 年)	283

第 1 章

中外农村城镇化特征、动力及路径模式

本章主要从世界范围分析比较各国农村城镇化路径、模式的异同。将农村城镇化界定为：发生在农村地域的城镇化过程，表现为农村地区小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多（包括城镇人口回流和农村人口汇集），产业活动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农业经营方式由传统小农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农业转变，小城镇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地域景观、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不断由农村型转化为城镇型。

1.1 中外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综观中外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规律与大中城市周边地域城镇化有明显不同，即世界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普遍的滞后性（图 1-1），并且一般会经历从对外输出型城镇化到自我发展提升型城镇化的转变。当然，在一般规律下，中外典型的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又有其不同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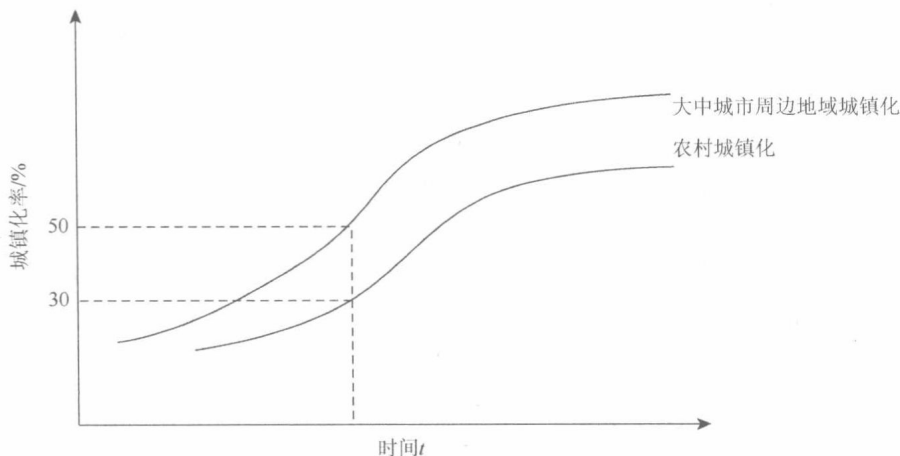


图 1-1 农村城镇化与大中城市周边地域城镇化历程比较

注：在时间 t ，大中城市周边地域城镇化已步入中后期，而农村城镇化则刚进入增长期

1.1.1 美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美国农村城镇化历程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对外输出型城镇化（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使得美国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农村地区以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外输出为主；另外，农业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家庭农场广泛出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西进运动也带动了西部小城镇的兴起。

1) 农村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转移，呈现出区域性迁移特征

农业生产水平提升，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急需生产要素的集聚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壮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1790 年美国只有 5 个城市人口超过 1 万；1875 年已有 15 个城市人口超过 10 万，其中纽约人口高达 130 万；1920 年，纽约人口上升至 475 万，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和匹兹堡拥有 150 万，另外还有十多个城市拥有 50 万人（诺克斯等，2011）。美国的城市化率也大幅提高，1790 年城市化率仅为 5.1%，1920 年城市化率首次突破 50%（表 1-1）。

表 1-1 1790~1940 年美国城市化率增长情况（王春艳，2007）

年份	总人口/万	城市化率/%	年份	总人口/万	城市化率/%
1790	3.9	5.1	1880	50.2	28.2
1820	9.6	31.4	1920	105.7	51.2
1860	7.2	19.8	1940	131.7	56.5

此外，美国城市发展是非均衡式的，北部先进，南部落后，导致人口整体呈现区域性的由南向北迁移趋势，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拖拉机的使用解放了农场工人，大量黑人从落后的南部农村地区迁往北部工业城市。

2) 交通网络建设加速了农村地区物资输出

农业的发展提升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工业化的不断扩张又急需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发达的交通系统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地区向大中城市不断输送物质资源。可以说，内河航运和铁路网的快速建设加速了农村地区这一时期的资源输出型特性，直到步入汽车时代，高速公路网的发展才开始引发郊区化雏形。

3) 中小型家庭农场广泛确立，农业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带动农村地区发展

自美国独立战争后，封建领地制被粉碎，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南北战争时期政府对参战士兵的赠地、西进运动和 1862 年《宅地法》的颁布，使得家庭农场数目激增，但规模以中小型为主。据统计，1850~1860 年，全国农场数目增加了 41%，1860~1900 年，农场数目由 204.4 万个增长为 573.7 万个，农场总面积净增了 4.3 亿 acre^①。至 1900 年，美国 1000 acre 以上的大型农场仅 4.7 万个，为农场总数的 0.8%；中小型农场则多达 569.1 万个，占总数的 99% 以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86）。此阶段美国中小农场雇佣不多的工人，广泛面向市场，这种稳固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和商品化发展。

另外，美国地广人稀，人力资源的缺乏使美国农业发展非常重视机械化和技术革新，从而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商品经济。1800~1840 年，种收 1 acre 小麦所花时间从 56 个工时缩减至 35 个工时。1800~1860 年，美国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递增 3.1% 的速度，共增长了近 5.4 倍，1850 年农产品商品率已达 30%（菲特等，1981）。19 世纪末美国农业已告

① 1 acre（英亩）= 0.004047 km²。

别自给自足，开始面向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总的来说，美国坚实的农业产业基础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

4) 西进运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西部小城镇的发展

19世纪40年代的西进运动促使西部农村地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与东部城市发展的渐进式不同，西部城市则是伴随当时的开发热迅速成长，出现了大量基于土地投机行为由企业家直接规划建立的市镇(town)、因淘金热的采矿城镇、基于畜牧业的“牛镇”等。这些城镇有部分发展为大中城市，如辛辛那提、旧金山等，还有部分则作为小城镇渐渐发展起来。总体来说，伴随开发热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众多小城镇的发展。

2. 第二阶段：双重提升型城镇化（20世纪中期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之后，美国城市发展以大都市区为主要形态，便捷的高速公路网加速了城市郊区化现象，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地区的发展，美国家庭农场也步入专业化、公司化阶段，农村城镇化进入稳步发展期，规模和质量双重提升。

1) 城市发展大都市区化、郊区化及逆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人口增长

大都市区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及与这个核心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地区组成，一般是人口众多且稠密的地区。工业化使得美国大中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汽车时代来临、高速公路网的发展引发了大量的卫星城和卧城建设，人口开始不断向郊区迁移，构成了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基本条件。美国大都市区不断发展壮大（表1-2），至今都市区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0%以上。

表 1-2 20 世纪初至今美国大都市区发展情况（黄勇 等，2001）

时间	20 世纪 20 年代	20 世纪 40 年代	21 世纪
大都市区个数/个	58	140	331
大都市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34	48	>80
百万人以上大都市区个数/个	5	11	60

资料来源：依据相关资料整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郊区化纵深发展带来的逆城市化现象开始显现，许多小镇和乡村地区几十年来首次获得了人口增长（诺克斯 等，2011）。非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开始超过大都市区（图1-2），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数据显示，约80%的非大都市区人口开始



图 1-2 美国城乡人口增长率长期变化趋势及 1950 年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增长率变化（贝利，2008）

增长。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南部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为 1%~3%，至 70 年代人口增长率已提升至 15%~20%，其中部分地区是旅游胜地、娱乐天堂、退休疗养地。

1970 年以后美国的人口迁移流向也发生逆转，都市区的迁入人口开始减少，非都市区的迁入人口则出现增长（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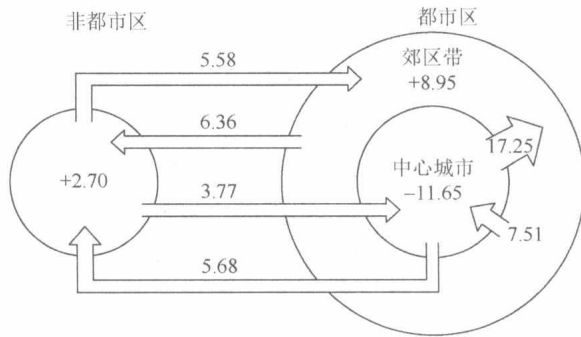


图 1-3 1970~1978 年美国人口迁移趋势（贝利，2008）（单位：万人）

从城市回流的人口大多是城市退休的职工，他们一部分来到小城镇后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为小城镇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理念；还有一部分则单纯回乡养老、度假，刺激了小城镇旅游服务产业的兴旺，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2) 日益发达的交通网络建设为农村城镇化推进提供了重要依托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福特主义”（Fordism）模式的出现、汽车时代的来临，美国政府开始将市际公路建设作为政府投入的重点，并逐渐拓展到对州际公路和一级、二级公路系统的建设。高速公路网的不断建设完善，有力推动了美国城市化由大中城市向郊区并最终向农村地区扩散的进程。美国早期的小城镇主要分布在州际公路和市际公路干线两侧，现今发达的交通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的乡村小城镇地区，小汽车也成为小城镇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交通网络系统的完善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成为美国农村城镇化的阻碍，越来越多的企业反倒被小城镇更低廉的地租和更低价肯干的劳动力吸引。

除了公路系统外，新型航空技术也为小城镇交通网络建设带来了新的福音，成为吸引居民的另一优势。在价格下降后，小型喷气式飞机成为人们短途旅行方便又快捷的选择。小飞机能直接在分布于小城镇的 5000 多个小型机场完成起落，居民基本能在 30 min 内驱车前往，而其航线又能避开交通枢纽中心，直达目的地，使得价格更加低廉，无疑成为短途旅行的极佳选择。

3) 家庭农场逐渐规模化，并步入专业化、公司化发展新阶段

20 世纪中叶起，美国家庭农场的数量开始下降，而规模却在不断扩大，据统计，1950~1998 年，农场数量从 596.7 万个锐减至 219.2 万个，而同期农场平均规模却从 191 acre 增长至 435 acre。其中，小型农场在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数量减幅最大（表 1-3）；中型农场则在竞争中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地位；大型农场的数量则有稳步提高，1950~1998 年，500 acre 以上的农场数量增幅为 43.4%。美国农场已走上规模化经营道路。

表 1-3 1950~1998 年不同销售额小型农场减幅统计（刘志雄 等，2005）

年销售额	20000 美元以下	1000 美元以下	5000 美元以下	2500 美元以下
减少幅度/%	19	62	62	80

同时,专业化生产的巨大优越性使得美国农场开始注重从事某一类产品的专业化经营。1950~1980年,专业化农场占农场总数的比例由87%上升至99.9%,同期同时经营两三类产品的综合性农场数目却从49.5万个锐减至2000个(吕志勇,1988)。

虽然家庭农场一直是美国农场的主导类型,2000年其占农场总数的比重已达84.8%,但实际上不少家庭农场已成为由家庭投资控股或家庭承包经营的公司型农场。公司农场所占比重并不高,但其规模更大,1998年其平均规模达2360.6 acre,约为家庭农场的7倍,此外其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多为农工商联合经营。

4) 农村小城镇迅速发展,获得规模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以发达交通系统为依托的逆城市化现象带来了人口的逆向流动,使农村地区小城镇迎来了发展的生机,农村小城镇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都是农村城镇化稳步推进的重要支撑。

一方面,休闲旅游、娱乐疗养型小城镇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改善,便宜的地价和劳动力吸引了城市企业的分厂入驻,使得小城镇有了自身的产业支撑。此外,农场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亟须小城镇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及农场工人的住所,所以以农业为依托的服务型小城镇成为美国农村城镇化的主体力量。

1.1.2 英国、法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1. 第一阶段:对外输出型城镇化(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中叶)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推进现代意义城镇化的国家,从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中叶,英国的农村城镇化呈现对外输出型特征。法国城市化起步比英国晚了半个多世纪,第一阶段时间为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中叶。农村城镇化进展缓慢,受到工业时代效率至上思想的冲击,其主体特征均为:

1) 农村人口、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等要素不断向大中城市输出

英国工业革命后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大中城市,强制性的圈地运动推动了这个过程。1750年英国城市化率仅为21%,至1851年已达51%(Wrigley,1992),20世纪初则超过70%(张伟光等,2010)。同样,法国自19世纪中期起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表1-4),1851~1931年,城市化率由25.5%上升至51.2%。这期间大中城市不断膨胀,形成大都市区,伦敦和巴黎均为典型。

表1-4 1876~1911年法国农村迁往城市人口数量(杨澜等,2008)(单位:万人)

时间	1876~1881年	1881~1886年	1886~1891年	1891~1896年	1896~1901年	1906~1911年
农村迁城人数	82	45	57~58	57~58	67	77
年均迁城人数	16.4	9.0	11.4~11.6	11.4~11.6	13.4	15.4

2) 交通网迅速覆盖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

与美国一样,运河和铁路网的快速建设加速了农村资源要素的输出。英国1842年已修建人工运河3960 km,1855年铁路总里程达12960 km(董永在等,2007)。法国1830~1850年新修铁路线3046 km,1835~1848年新开凿运河2000 km(杨澜等,2008)。

3) 城市工业化一定程度牺牲了农业发展,城乡差距更为明显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农业革命曾取得极大成功,但19世纪70年代后

“重工轻农”的思想开始使得英国农业发展水平停滞不前，国家所需农产品开始依赖进口。据统计，1910年英国的粮食自给率仅为35.6%（陈鸿彬等，2005），农产品贸易逆差更使得本土农业遭受更大竞争压力。法国农业曾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迎来了农业黄金时代，但紧接其后国内动乱的政局和19世纪末世界范围的多次农业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法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总之，西欧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发展相对落后，更加大了城乡差距。

4) 政府城市规划管控思想开始显现

大中城市的不断膨胀也给西欧带来了郊区化趋势，但与美国放任自由的处理方式不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开启了新城建设的风潮，政府开始重视城市规划的管控作用和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思想，为后期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埋下伏笔。

2. 第二阶段：特色发展型城镇化（20世纪中期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英国城市规划所取得的成功促使其他国家也开始重视政府的管控。政府力的注入对农村城镇化推进有重大作用，西欧步入特色发展型城镇化阶段，农村城镇化质量稳步提升。

1) 农业补贴政策促使农业生产水平稳步提高，为农村城镇化推进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于1947年、1957年、1964年、1967年和1970年多次颁布农业的相关法令，政府开始全面扶持和高额补贴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

法国在发展一体化农业（agricultural integration）后，通过高额补贴和配套扶持政策，形成农业和工商业等相关产业相结合的一体化系统，加强了农业与其前后向产业部门的联系，延长产业链，以工补农，有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此外，从欧洲共同体到欧洲联盟（简称欧盟），统一的农业政策和扶持机制更使得欧洲整体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欧洲共同体就实现了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自给，并开始出现生产过剩。农业的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推进奠定了基础。

2) 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促使农村小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不断完善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囊括了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最终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且城乡居民的福利保障完全无差异。福利国家制度有效弥补了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差距和社会断层，农村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全面提升。

3) 非大都市区开发使农村城镇化获得特色产业和基础设施支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政府主张对仍属于边缘区的非大都市区建立新的增长中心，并加强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同时采取奖励和限制手段影响企业选址。政府对非大都市区开发的投入使农村城镇化质量迅速提升，小城镇获得自身产业支撑，形成地方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获得全面提高。

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积极在农村地区开展城镇建设，以重点建设中心镇来促进农村地区人口和产业集聚。小城镇在各项政策支持下有效承接了核心区部分产业的转移，构建了自身特色产业。同时在政府的大力投资下，小城镇基础服务设施质量获得很大提升。

法国同样通过开展领土整治，由立法和各项优惠政策调整不平衡的产业布局，吸引企业在小城镇选址。在此契机下，小城镇有效发展了农村工商业，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

4) 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积极保护及都市农业的兴起，促使农村小城镇特色三产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各项政策加强了对各项自然和人文资源保护的力度,小城镇建设非常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并体现自身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都市农业越发兴起,农业的生态景观功能开始被发掘,特色都市农庄展现魅力,两者共同带动了农村小城镇休闲旅游、观光游览等特色第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注入全新活力。

1.1.3 日本、韩国农村城镇化历程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经了短暂的重建恢复期后,日韩迈上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相较欧美而言,日韩属于后发展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晚,人口基数大,国土面积紧张,其发展模式具有时空上的压缩特性,即国家在快速推进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农村地区发展,开启农村城镇化进程。

1. 第一阶段:输出与发展并存型城镇化(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

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日韩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镇化率趋于稳定。与欧美国家不同,这阶段其农村城镇化在政府主导下同时有序推进,呈现出输出与发展并存型的城镇化特征。

1) 农村人口和资源要素主体向大中城市输出集聚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国土面积的限制使其选择的都是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紧凑型、聚集型城市化道路。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农村人口和各项资源要素主体均向大中城市集聚。

从1955年起,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农村人口迅速被大城市吸收,尤其是三大都市圈迅速增长(表1-5),出现人口过密化现象。1955~1969年,共计145.4万人流入三大都市圈,1975年三大都市圈总人口增长至5215.6万,占日本总人口46.6%。与之相对,农村人口大幅减少,1955~1965年全国47个都道府县(日本政府体系分为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个层级,都道府县类似我国省市级行政单位,市町村则类似于我国县乡级行政单位)中有25个县人口下降,3375个市町村中有2574个人口减少,其中人口减少10%以上的市町村有897个,减少20%以上的有117个,减少30%以上的有36个(焦必方等,2009)。

表 1-5 1955~1975 年日本三大都市圈人口增长统计(王勇辉,2011) (单位:万人)

年份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东京都市圈	1542.4	1786.4	2101.7	2411.2	2704.2
大阪都市圈	1017.4	1140.4	1307.0	1453.8	1569.6
名古屋都市圈	683.9	732.9	801.3	868.8	941.8
合计	3243.7	3659.7	4210.0	4733.9	5215.6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后,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农村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集聚,直至80年代农村输出人口数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80年代后迁城人口才开始趋于稳定并有所减少(表1-6)。从韩国城市规模结构变化趋势(表1-7)可见,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使得韩国的大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韩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逐渐呈现两头少中间多的纺锤状分布,且城市人口数量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逐级递增,尤其是从50万~100万及100万以上城市这两级,人口增幅呈现巨大跳跃性,说明韩国是典型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最典

型的首尔市，在1990年人口高达1060.3万，约为全国人口的1/4，而整个首都圈人口则接近全国人口半数。

表 1-6 1965~2000 年韩国农村迁往城市人口数量（李恩平，2006）（单位：万人）

迁城人数	1965~1970年	1970~1975年	1975~1980年	1980~1985年	1985~1990年	1990~1995年	1995~2000年
农村迁城人数	199.04	191.67	308.21	289.38	269.68	138.46	89.94
年均迁城人数	39.81	38.33	61.64	57.88	53.94	27.69	17.99

表 1-7 1960~2000 年韩国城市规模结构变化趋势（李恩平，2006）

规模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100万	2	360	51.6	3	848	65.6	4	1421	66.3	6	2069	64.4	7	2224	54.2
50万~100万	1	67	9.7	2	114	8.9	2	138	6.4	6	347	10.7	10	676	16.5
25万~50万	2	71	10.2	2	67	5.2	7	236	11	7	234	7.3	21	668	16.3
10万~25万	4	70	10.1	11	137	10.6	21	303	14.2	22	345	10.7	31	455	11.1
5万~10万	18	129	18.5	4	125	9.7	6	44	2.1	32	221	6.9	10	82	2.0
总计	27	399	100.0	32	1292	100.0	40	2143	100.0	73	3125	100.0	84	4323.5	100.0

注：a为城市数量（个）；b为人口数（万人）；c为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百分比（%）

2) 在政府主导下，农村城镇化有序推进、有效发展

大中城市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得日韩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出现了人口过疏现象，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弱化等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功能，拉大了区域差异，社会经济的不平衡进而也抑制了大城市的发展。对此，日韩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扶持发展农村落后地区，农村城镇化也开始稳步推进，农村风貌大大改观，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1) 农特产业得到有效发展。日韩政府通过多项立法积极保护农业发展，补贴扶持农业经济，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大幅提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户收入也得到长足增长。据统计，1960~1975年，日本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之比由0.7上升至1.03，农村人均收入已经高于城市居民。而198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城市劳动力的1.13倍。此外，农业在政府扶持下，结合小农经营的特点，走上了农业特色化（农特）发展道路。最早推行一村一品运动的日本大分县，1980年共有143种农特产，2001年增长至336种，总产值高达1410亿日元，其中126种产值达100万美元以上，15种甚至高达1000万美元以上（陈磊等，2006）。韩国通过新村运动也积极发展农特产业，1967~1990年，共建立了315农特产品开发复合区，支持农特产品开发。

(2) 大量中小企业入驻农村小城镇地区。这阶段，政府采取了城市工业分散化的引导政策，促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因政策导向，日本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于农村选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农村非农业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韩国也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期间鼓励企业在农村落户，兴办了各种“新村工厂”，大力发展农村工业，90年代后又开始积极开发农村旅游业，获得了成效。